

当代利比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困境

李小娟*

内容提要 当代利比亚政治发展经历了利比亚王国、卡扎菲和后卡扎菲时期三个阶段，各阶段政治发展困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利比亚王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支持下成立，长期的外族统治和地缘分裂导致利比亚政治构建缺乏内聚力，王权合法性呈现出“脆弱性”特征。卡扎菲政权困于历史遗留的地缘分裂问题，囿于民族与国家构建的悖论，与西方国家矛盾重重，导致利比亚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继承了卡扎菲时期的诸多政治困境，并出现新的政局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是困扰利比亚政治发展主要的原因之一，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的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的较量，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牵绊是导致利比亚政治合法性危机凸显的三重维度。

关键词 利比亚 政治困境 政治合法性 伊斯兰因素 部落因素

自2019年4月起，利比亚深陷内战旋涡，全国对话大会被迫无限期推迟。2020年1月13日，关于利比亚停火问题的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但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武装力量“国民军”并未达成停火协议，内战面临再度升级的可能。中东剧变以来，受地区整体性动荡的影响，利比亚出现了政权更迭，其国内的两个政权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政治危机频频浮现，这与利比亚政治发展过程遭遇的困境联系密切。当代利比亚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利比亚王国、卡扎菲和后卡扎菲时期三个阶段，各阶段政治发展困境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政治合法性危机是利比亚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的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部族

* 李小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义的较量，以及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牵绊是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凸显的三重维度。研究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困境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利比亚当前的政治局势，而且也对把握利比亚政局的整体走向提供了借鉴。学术界关于利比亚政治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卡扎菲的政治实践和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政治重建与前景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还涉及部落因素在利比亚政治发展道路中的影响以及利比亚民主政治的发展等。^①目前，学术界仍然缺少从宏观层面深入讨论利比亚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困境。本文尝试从利比亚在政治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困境与合法性危机出发，探讨其政治发展和道路转型举步维艰的原因与前景。

一 利比亚政治发展困境的主要表现

一般而言，政治形态的变迁先从局部的调整开始，一旦经过必要的量的积累，便会进一步导致总体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一政治形态的调整与变化的历史过程，就是政治发展。^②马克思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形态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总体性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水平和特定的表现形式。利比亚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各个阶段的政治发展中都出现了不同的困境，正是这些困境和危机推动着利比亚政治形态的不断变化，从而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进步。利比亚政治发

① 相关成果参见：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1986; Mansour O. El-Kikhia, *Libya's Qaddafi: The Politics of Contradict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Dirk Vandewalle, *Qaddafi's Libya, 1969 - 199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95; Zahra' Langhi, "Gender and State-building in Libya: Towards a Politics of Inclusio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9, No. 2, 2014, pp. 200 - 210; Edward Randall, "After Qadhaf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2, 2015, pp. 199 - 221; Noureddine Jebnoun, "Beyond the Mayhem: Debating Key Dilemmas in Libya's Statebuilding,"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5, 2015, pp. 832 - 864;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王金岩《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133~147页；韩志斌、闫伟《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及前景》，《国际论坛》2013年第1期，第7~12页；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115~133页；韩志斌《利比亚政治危机的历史探溯》，《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26~35页；陈万里《试析卡扎菲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第73~79页。

② 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49页。

展困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

(一) “脆弱”的独立王权与地缘危机

利比亚是在大国的直接干预下独立的，对大国的依赖性强，政权呈现“脆弱性”特征，这一点始终困扰着利比亚王国的政治发展。二战后，利比亚因其战略位置的优越性成为大国政治角逐的舞台之一。关于利比亚的前途问题，各国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提出了多种方案。1945~1949年，大国经过多次协商，都未达成一致意见。1950年11月5日，利比亚国民议会在黎波里首次召开，议员们就独立后国家政体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他们最终决定在利比亚成立联邦制国家。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联合王国正式宣告成立。^①1963年，改称“利比亚王国”。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利比亚既未经历解放运动，也未进行独立战争，利比亚人在茫然中迎来了国家的独立。^②因此，民众对新生国家缺乏政治认同。利比亚王国的合法性源于联合国的支持和利比亚部落的协商传统。实际上，除昔兰尼加外，利比亚其余两个地区对伊德里斯一世的认同度低。此外，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导致伊德里斯一世严重依赖大国的支援，政权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特征，君主合法性存在缺陷。

历史上，长期的外族统治和大国竞争加深了利比亚的地缘分裂。利比亚地缘政治的形成深受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统治的影响。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占领的黎波里，开始了对利比亚的漫长统治。但是，利比亚的贫瘠使其被边缘化，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帕夏管理政策呈现出松散性特征，导致部族势力进一步发展。^③意大利在攻占利比亚之后，采取了“部族战略”和“上层攻略”的统治方式，通过挑拨离间等方式逐步实现对整个利比亚的征服。^④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加深了利比亚各地区和部落之间的鸿

①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p. 52.

②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5.

③ Ali Abdullatif Ahmida, *Forgotten Voice: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p. 34.

④ 王金岩 《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74页。

沟，增加了民众对其所在地区和部族的认同。另外，利比亚三个地区被沙漠隔开，是一个天然的破碎地带，而它们却与周围的邻国无天然屏障，受邻国的影响巨大。西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马格里布国家在人种和语言文化方面相近，东部昔兰尼加同其近邻埃及和马什里克地区关系密切，西南部费赞地区的文化习俗同撒哈拉以南非洲联系紧密。经济较为发达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以政党为核心的部落统治为主，昔兰尼加是以伊德里斯家族为核心的教团统治，而费赞则是以赛弗·纳西尔（Saif Nassir）家族为核心的政权。地缘的分裂严重影响到利比亚的政治整合。^① 在利比亚独立之初，三地区对于国家结构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的黎波里塔尼亚支持建立共和制政府，昔兰尼加希望在伊德里斯家族的统治下建立联邦制政府，费赞地区则对国家的政体问题表现冷淡。经过多次协商，三方选择了松散的联邦制，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利比亚地缘分裂的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旨在缔造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恢复阿拉伯人历史上的荣耀。埃及总统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主要继承人和宣传者，通过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以及大量埃及教师，纳赛尔的思想在利比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1953年到1956年，利比亚依次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签署了友好协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加密切。^② 然而，这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无异是对利比亚殖民统治的延伸。随着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深入人心，利比亚的民众已经对国王彻底失去信任。^③ 伊斯顿认为，当政府不能满足民众的愿望，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继而引发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危机。^④ 伊德里斯一世长期依赖外部势力支持，作为条件，允许外部势力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干预利比亚的政治发展。此外，以昔兰尼加伊德里斯家族为核心的寡头政治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致使王权的合法性基础被削弱。当公民通过合法渠道无法

① 王金岩 《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80页。

②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Oxford: One World, 2009, p. 117.

③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6.

④ (美) 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第192页。转引自李意 《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38页。

实现有效的诉求时，必然会对政府体制失去信任。^① 伊德里斯一世的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进一步加深。随着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不断挑战，王权合法性彻底丧失，卡扎菲领导的政治革命最终爆发。

(二) 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挑战

1969 年 9 月 1 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一世的统治。“九月革命”是利比亚民族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成立的政府通过解放斗争的形式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弥补了伊德里斯一世依赖外部力量建国的合法性缺陷。此后，他在纳赛尔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以伊斯兰教、平均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思想理论——“世界第三理论”。^② 从 1976 年至 1979 年，卡扎菲陆续出版了三本小册子《绿皮书》，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第三理论”的具体方案。^③ 强调建立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以伊斯兰教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又称伊斯兰社会主义。^④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卡扎菲在政治方面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民众国体制改革，实现群众直接掌握政权的政治理想。^⑤ 在经济领域，利比亚推行经济国有化政策，其重点是政府控制石油资源，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⑥ 卡扎菲强调民生问题的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在这里没有工薪阶层，只有合伙人，土地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⑦ 通过这些经济措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缓解了社会矛盾，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⑧ 据统计，卡扎菲掌权后，利比亚人口数量增长到之前

① 李意 《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 39 页。

② 王铁铮主编 《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 223 ~ 224 页。

③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

④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

⑤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2.

⑥ Lisa Anderson, “Religious and State in Libya: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83, No. 1, 1986, pp. 69 - 71.

⑦ Mu‘ammar al-Qadhafi, *The Green Book, Part Two: The Solution to the Economic Problem*, UK: Ithaca Press, 2007, p. 39.

⑧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2.

的6倍，民众平均寿命由之前的51岁提高到74岁，男性识字率增长到95%，女性识字率增长到78%，人均收入增加到16300美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提到“利比亚妇女可以自由地工作，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衣……文盲几乎被扫除。”^①

然而，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实践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在政治方面，卡扎菲致力于铲除伊德里斯一世的残余势力，清除军队异己，确立个人权威。这些措施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新生政权的对立面，加深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在经济方面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单一化问题，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产业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但这些产业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高，且受国际石油市场波动的制约，经济发展不稳定。另外，在石油财富的分配政策上，卡扎菲政府未能摆脱伊德里斯一世所遗留的部落政治的影响，偏向西部地区而忽略东部地区，招致东部部落对卡扎菲政权的不满。在对外关系上，卡扎菲输出革命的政策导致周边国家的质疑，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利比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1988年，震惊世界的“洛克比空难”以及随后长期的国际制裁，使利比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②

国际社会的制裁使利比亚的经济遭受重创，民众的生活水平骤降，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收入的锐减还使利比亚不得不大规模削减军费预算，严重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稳定，卡扎菲政权日益受到极端势力的威胁。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困境，卡扎菲认识到孤立的危险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迫切性。他转变一贯主张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和温和的态度转变，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多次向美英等西方国表达希望改善关系的观点，使利比亚摆脱困境。^③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面对萨达姆政权的倾覆和美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还呼吁世界各国都应该放弃核武器的研制，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

① Maximilian C. Forte, *Slouching Towards Sirte: NATO's War on Libya and Africa*, Chicago: Baraka Books, 2013, p. 143.

② Yehudit Ronen, *Qaddafi's Libya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 49.

③ Edward Randall, "After Qadhaf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2, 2015, p. 204

的称赞，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对于利比亚表现出的积极态度，美国也采取了正面的回应，逐步实现与利比亚关系的正常化。2005 年，利比亚在阿拉伯国家峰会上呼吁阿拉伯国家与利比亚建立外交关系。利比亚的行动缓和了与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利比亚以新的姿态登上了国际社会舞台。

至此，利比亚看似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制裁解除后，利比亚的石油产业恢复，国际公司投资加大。然而，利比亚未能解决青年人失业的问题，贫困现象依然严峻。利比亚威权政治下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排斥开放经济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此情况下，卡扎菲的改革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世界银行 1996~2011 年的治理指标显示，利比亚在改善经济治理、走向多元化市场方面进展甚微。^① 卡扎菲主动向西方示好和积极推动利比亚政治转型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维持威权统治和巩固政权的考虑。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是双方在各自利益考量下的暂时妥协，两者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利比亚民众对美国仍然持排斥态度，他们对 1986 年美国的狂轰滥炸和漫长制裁中艰难的生活记忆犹新。

(三) 卡扎菲政府倒台的背景及影响

2011 年 2 月，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随着暴力冲突的不断加剧，利比亚内战爆发。面对民众的游行活动，卡扎菲选择了武力镇压，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国家过渡委员会”，与卡扎菲政府分庭抗礼。随着联合国安理会重启对利比亚的制裁和北约的军事攻击，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很快攻入首都的黎波里，终结了卡扎菲政权。卡扎菲的死亡标志着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

利比亚战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务”的原则，形成“利比亚化”的国际干预新模式，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② 此外，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并没有出现像大多数民众所想象的“民主和自由”，相反的是，派系斗争被不断激化，社会秩序混乱，经

^① World Bank,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Country Data Report for Libya*, 1996–2013; 转引自 Edward Randall, “After Qadhaf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2, 2015, p. 205.

^② 韩志斌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 291 页。

济严重下滑，民生问题严峻。西方的军事干预是造成利比亚持续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改变了利比亚政治发展的轨迹和相对富裕的生活状态。西方的干预也为自己种下了恶果，就像卡扎菲在回应北约国家空袭初期所说的那样“利比亚政权一旦崩塌，恐怖集团将在中东崛起并殃及欧洲”。^①

卡扎菲倒台后，新政府的行政制度和机构被一再废除和破坏，加深了政治危机。动荡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为部落联盟铺平了道路，从而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的领导权和政治道路的意见不一，他们通过参与国有资源控制权的竞争，目的在于为自己所在的部落和地区牟利，而非促进国家建设。^②从2012年至2018年，利比亚议会选举多次陷入僵局。2016年，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利比亚东西两个议会的代表签订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协议。然而，民族团结政府威权缺失，对于社会稳定和民生问题无所作为，导致民众认同的下降。^③后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新政权不仅继承了伊德里斯一世时期地缘分裂和部落政治的历史包袱，还沿袭了卡扎菲时代向部落政治回归所造成的国内乱象，威权政治崩溃的后遗症将长期影响利比亚的政治发展。

紧张的局势、分裂的社会、派系的斗争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下降是利比亚后卡扎菲时代主要的特征。2019年4月4日，哈夫塔尔麾下的“国民军”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不断逼近，试图从获得国际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手中夺取首都控制权，双方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此次冲突造成利比亚各地物价上涨，双方多人死伤，难民和移民数量增加，利比亚局势陷入紧张状态。^④12月19日，反政府武装“国民军”空袭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造成民族团结政府军约25人死伤。^⑤2020年1月13日，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在莫斯科进行了谈判，但利比亚“国民军”

① Carmen Geha,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Lebanon and Libya: Transition and constraint*, New York: Routledge, pp. 125 - 127.

② Noureddine Jebnoun, "Beyond the mayhem: Debating Key Dilemmas in Libya's Statebuilding,"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5, 2015, p. 837.

③ 王金岩 《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67~171页。

④ 王金岩 《利比亚：新背景下的新乱局》，新华网，2019年5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19-05/08/c_138021574.htm，登录时间：2019年8月10日。

⑤ Ayman al-Warfalli, "East Libyan forces target munitions in Misrata with air strikes," *World News*, November 19,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ibya-security/east-libyan-forces-target-munitions-in-misrata-with-air-strikes-idUSKBN1XT16D>，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3日。

领导人哈夫塔尔未签署停火协议，并于当日晚返回利比亚。此后，利比亚“国民军”再次向的黎波里发动新的攻势。这一事态可能引发区域局势进一步升级。

二 利比亚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三重维度

在利比亚的不同政治发展阶段，其政治困境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政治合法性危机贯穿其中，是引发利比亚政治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条件，当代政体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解决社会分裂问题的有效性。政权合法性危机随着政府的价值观与社会各团体的价值观之间裂缝的出现而出现。^① 利比亚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这三重维度，对利比亚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的对抗

恩格斯认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② 可以说，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承载的深厚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会产生重要影响。^③ 利比亚作为伊斯兰国家，其政治形态和合法性深受伊斯兰宗教意识的影响。早在 1969 年革命爆发之前，伊斯兰因素就已经密切参与利比亚的政治进程。伊德里斯政权的核心统治者赛努西教团就是借着圣裔的特殊地位获得政治合法化。赛努西教团是在 1798 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发展起来的伊斯兰苏菲派教团，是由赛义德·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 (Said Muhammad bin Ali al-Sanusi) 创建。该教团在反对外来殖民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1 年，利比亚建立君主立宪制，由赛努西之孙，原昔兰尼加的埃米尔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 (Said Muhammad Idris Mahdi

①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 5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458 页。

③ 李意 《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第 110 页。

Sanusi) 任国王。^① 伊德里斯国王不仅是一位世袭君主，还是赛努西教团的首领。因此，他的权威最终源于遵守伊斯兰教法，显然，如果允许任何组织解释和质疑伊德里斯君主政体的合法性，都将对该政权产生严重后果。伊德里斯政权建立后，穆兄会认为自己倡导的思想更加符合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因而成为伊德里斯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挑战之一。^②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通过“九月革命”上台，利比亚内部的教派分化变得激烈。新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和提倡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其统治基础。宪法第二条提到伊斯兰教是民族宗教，阿拉伯语是民族语言。^③ 宪法表明了伊斯兰教是其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扎菲本人也不断提到伊斯兰教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卡扎菲政权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与伊德里斯王朝截然不同。他更愿意将伊斯兰教视为动员民众和指责君主制腐败的工具。1973年，卡扎菲试图在利比亚开展更加激进的变革，确立民众国体制，伊斯兰教成为利比亚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目标。1973年4月13日，卡扎菲在祖瓦拉的一次讲话中呼吁变革伊斯兰教法，在利比亚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之后，他下令逮捕了原教旨主义组织穆兄会和伊斯兰解放党（Hizbul-Tahrir al-Islami）的部分成员。^④

1977年，卡扎菲在利比亚全国人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利比亚进入“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众国时代”，对利比亚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利比亚建立了“民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和监督政权”的形式。按照卡扎菲《绿皮书》推行经济领域的国有化改革。将宗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削弱了传统乌莱玛的权力基础。伊斯兰势力认为民众国建立的国有化的经济结构与《古兰经》对私有财产的规定背道而驰。的黎波里伊斯兰组织抱怨政府将宗教基金国有化的政策，认为这是对《古兰经》中认可的私人财产的漠视。^⑤ 传统的乌莱玛认为，民众国没有遵循伊斯兰教法建立国家。宗教势力对卡扎菲的统治愈加不满。1978年7

①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p. 52.

② Abdulrahman Abdulkadir Kurdi, *The Islamic State: A Study Based on the Islamic Holy Constitution*, London: Mansell, 1985, pp. 64 - 65.

③ George Joffe, "Islamic Opposition in Liby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1988, p. 621.

④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 180.

⑤ 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163.

月，乌莱玛宣布卡扎菲的《绿皮书》与伊斯兰教不相容。^①卡扎菲则认为在没有乌莱玛指导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权理解圣训，唯有这样才能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这一看法摧毁了乌莱玛力量的基础，因为解释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他们的特权。卡扎菲还提出了变革伊斯兰教的建议，将伊斯兰教历元年改为穆圣逝世日；朝觐不再是一种义务；伊斯兰税收不再是固定的，可以变动。卡扎菲旨在摧毁伊德里斯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遗留和昔兰尼加传统精英的合法性，从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②经过斗争，卡扎菲成功化解了伊斯兰反对派的威胁。

然而，中东剧变的爆发释放了伊斯兰势力长期缺乏政治参与和受压制的状态，造成强势的反弹，它们组建政党，试图参与政治选举。目前，伊斯兰政党主要包括穆兄会和米苏拉塔的民兵组织，他们在利比亚内战中崛起，要求政治重建突出伊斯兰特征，使用沙里亚法治理国家，反对西式民主。世俗力量以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为主，他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崇尚世俗和自由，推崇宪政民主道路，反对伊斯兰政党参与选举。两派势力相互诟病，矛盾激烈。其结果是，利比亚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就国家的权力分配展开了一场争夺。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的较量

政治合法性依赖于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忠诚，政治认同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当民众自愿拥护时，其统治才更为有效，反之则会削弱政府的动员和政策的贯彻能力，导致政治动荡。因此，政治认同有助于政治统治获得合法性，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越高的国家，政治体系越稳定。部落是阿拉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部落的关系。^③部族主义传统削弱了民众对政府权威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认同，对政治现代化和合法性产生负面冲击，对政治发展产生震荡，带来认同危机和政治参与危机。卡扎菲所承接的社会的政治认同来源于人们对传统部族的认同，而非对统一国家的认同。部

① George Joffe, "Islamic Opposition in Liby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1988, p. 623.

② George Joffe, "Islamic Opposition in Liby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2, 1988, p. 624.

③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Security, Economy, Identity*, NJ: Prentice Hall, 2001, p. 512.

族的认同具有强烈的分散性特征，卡扎菲的政治建立在这一分散的社会结构之上，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支持，通过部族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忠诚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平衡。

然而，在卡扎菲统治初期，他并未将部族主义政治看作巩固政权的主要方式，相反他试图废除部落在利比亚社会政治中的作用，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忠诚来取代部落认同。卡扎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是对纳赛尔主义的继承，从而为其赢得了大量利比亚年轻人的支持。此外，卡扎菲政权承诺废除部落这一非现代国家机构的角色，建立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利比亚国家。但是，这一理念很快就与卡扎菲巩固政权和获得威权统治的根本需求相矛盾。显然，在利比亚这样一个几乎只有一种民族身份和宗教的国家里，制造重大政治分歧对巩固政权并没有实际益处，反而会引发潜在的挑战。为了维护其威权统治，卡扎菲需要一个政治工具来控制利比亚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利比亚社会传统的部落结构成为卡扎菲的唯一选项。他通过获得部落首领的忠诚来确保其对部落成员的控制，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卡扎菲给予自己所在的卡达法（Qadadifah）部落更多的权力，任命其亲戚担任重要的政府职位。^① 人民委员会成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介机构，其选举变得部落化。候选人通过部落渠道参与竞选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方式导致“部落之间……为了获得土地或政府职位展开血腥斗争”。^② 在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卡扎菲则获得了至高的权力和地位。

部落联盟越来越成为卡扎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扎菲非常谨慎地将包括外交职位在内的政府职位分配给各部落。他利用政治和行政职位将其作为奖励某些部落和惩罚甚至边缘化一些部落的有效工具。卡扎菲的政治塑造了利比亚人对部落身份认同的加深。对许多利比亚人来说，部落关系成为从国家获得工作、司法或财政支持的唯一途径。总之，部落已经成为利比亚国家稳定的保障。民众对部落的依赖反过来又增加了部落的忠诚

① Philip Khoury and Kostiner Josep eds. ,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0 , pp. 297 - 298.

② Mansour El-Kikhia , *Libya's Qaddafi: The Politics of Contradiction* , Gainesville ,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1997 , p. 103.

度，而卡扎菲则利用部落间的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权力。^① 在卡扎菲统治的 42 年里，利比亚部族主义的政治意义显著增加。可以说，利比亚部落认同感的上升是卡扎菲威权统治的结果。^② 利比亚部落角色的提升与卡扎菲巩固统治的战略有直接关系。但是，回归部落政治与卡扎菲革命初期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念有相互矛盾之处，成为卡扎菲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潜在威胁。另外，卡扎菲向部落政治回归的战略出现了诸多的弊端。

在政治方面，在卡扎菲的支持下，卡达法部落与瓦法拉 (Warfalla) 以及马加哈 (Maqarha) 部落结成联盟，成为卡扎菲政权的三大支柱。^③ 他们长期把持国家关键部门，将其他部落排斥在政权之外。在这种政治体系下，个人的晋升不是出于功绩，而是其所在利益集团偏袒或私下协议的结果。政府效能的指标不高，在缺乏法治和监管监督的情况下，腐败严重、治理缺失。^④ 世界银行的一份发展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2003 年在利比亚开一家网吧的官方注册程序需要花费两年时间。^⑤ 政治腐败抑制经济活力，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权的缺乏引起了边缘部落的不满，他们拒绝承认卡扎菲为统一国家的象征。在利比亚内战期间，反对派在米苏拉塔展示卡扎菲的尸体，就是受排斥的部落民众仇视卡扎菲的证据。^⑥

在经济方面，石油、天然气的出口使利比亚一跃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富国，但政府在经济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的分裂。表面上，卡扎菲政府倡导平均分配的原则，而在实际上则遵循部落传统的分配方式，即将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分配给政府，其余部分主要按照所在

①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6.

②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6.

③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 Qadhaf's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71-72.

④ Najy Benhassine, *From Privilege to Competition: Unlocking Private-Led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9, pp. 16-20.

⑤ Edward Randall, "After Qadhafi: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2, 2015, p. 204.

⑥ Noureddine Jebnoun, "Beyond the Mayhem: Debating Key Dilemmas in Libya's Statebuilding,"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5, 2015, p. 837.

部落和地区与卡扎菲关系的亲疏来分配。^① 卡扎菲支持下的三大部落势力所在的西部地区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以黎波里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则被卡扎菲政府边缘化，厚此薄彼的政策为卡扎菲统治的合法性埋下了隐患，这成为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各部落试图通过削弱对方的力量来增强自身力量，争夺对国家控制权。这种潜在的威胁在战争中一跃而起，致使战后的利比亚暴力冲突升级和扩散。^②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的牵绊

卡扎菲是纳赛尔的忠实拥护者及其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他认为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是恢复阿拉伯世界繁荣和免受国外势力压制的主要途径。他将利比亚国旗改为象征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红白黑三色横条旗，并试图与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组建联邦，实现统一。理论上，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将“民族”和“国家”合为一体，但在实践中，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的不重合性导致了泛阿拉伯主义联合的频频失败。^③ 卡扎菲向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恐慌，他试图组建阿拉伯联邦国家的理想均以失败而告终。埃及在“六五战争”中的失利，导致纳赛尔于1970年在忧虑和悲愤中去世，这位被卡扎菲视为阿拉伯民族救星的与世长辞致使阿拉伯世界再度分裂，泛阿拉伯主义日薄西山。

但是，卡扎菲并没有选择放弃追求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理想，他总结失败的经验，重整旗鼓。卡扎菲认为阿拉伯各国政权模式的差异是实现彻底统一的阻碍，他所创立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模式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应该模仿的范本。他强调在阿拉伯国家“创建利比亚式的政权”，即推翻各国家旧政权，进行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建立人民委员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整改。此外，卡扎菲还强调“泛非主义思想”，将利比亚看作是非洲的一部分，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非洲的统一相互促进。^④ 推行泛非

① 王金岩《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29页。

② Noureddine Jebnoun, "Beyond the Mayhem: Debating Key Dilemmas in Libya's Statebuilding,"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 5, 2015, p. 837.

③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58页。

④ 潘蓓英编著《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02页。

主义的政治理念，即在利比亚的领导下实现非洲的一体化。

在卡扎菲《绿皮书》第三部分“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中，有“黑人称雄世界”这样的标题，卡扎菲此举旨在拉近与黑人的关系，为其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作铺垫。最典型的例子是卡扎菲与当时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亲密关系。1998年3月，曼德拉在接见来访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时曾说“我还邀请了兄弟领导人卡扎菲来到这个国家。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权威要求我们不应该抛弃那些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黑暗时刻帮助我们的人。作为回报，他们（利比亚）不仅支持我们，而且给了我们资源，让我们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和……”^①另外，利比亚还对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清真寺等方面进行投资，据估计，投资资金达1500亿美元。^②卡扎菲对投资非洲建立医院和清真寺方面尤为积极，旨在提升卡扎菲在非洲民众心中的地位。在此期间，以卡扎菲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和清真寺遍布非洲大陆。卡扎菲在2005年非盟首脑会议上直接谈到主权和自卫免受外国干涉的问题。他警告说，不要像过去和现在那样，让小国与庞大的经济集团谈判。他认为应该依托非洲丰富的资源，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2005年7月，在利比亚举行的非盟第5次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呼吁建立统一的非洲大陆防卫体系。^③

对于许多非洲人而言，他们将利比亚看作自己的目的地或通往欧洲的桥梁。卡扎菲在1999年9月非盟首脑会议上表达了利比亚欢迎非洲裔移民的意愿，也表示将继续接收阿拉伯移民。卡扎菲曾经说“持有护照的非洲人可以自由进入利比亚，并且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停留三个月，非洲人将比其他外国人更容易获得居住和工作许可。”^④但是，西方的制裁已经导致利比亚的石油市场不断收缩，制裁引起的经济衰落导致一些利比亚人对非洲移民的不满。随着制裁的加剧和国内经济的困境，2000年9月，利

① Maximilian C. Forte, *Slouching Towards Sirte: NATO's War on Libya and Africa*, Chicago: Baraka Books, 2013, p. 142.

② Maximilian C. Forte, *Slouching Towards Sirte: NATO's War on Libya and Africa*, Chicago: Baraka Books, 2013, p. 138.

③ Henning Melber, *The New African Initiative and the African Unio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and Documentation*,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1, p. 5.

④ Maximilian C. Forte, *Slouching Towards Sirte: NATO's War on Libya and Africa*, Chicago: Baraka Books, 2013, pp. 176 - 177.

比亚政府下令镇压“非法移民”，导致利比亚社会氛围的紧张。

利比亚在非洲越来越广泛的存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威胁。美国大使馆认为，这是卡扎菲在“向非洲政府施加额外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以支持他实现统一非洲的梦想”。之后，奥巴马政府冻结了利比亚中央银行300多亿美元的资产。^①可以说，卡扎菲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将自己困于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极大地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利比亚在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这对利比亚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政治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削弱了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由于卡扎菲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联合的理想之中，对国内事务的管理有所松懈，利比亚自身政治领域存在的潜在问题并未得到实质上的解决。另外，卡扎菲向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和试图领导非洲走向统一的政治理念招致了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敌视。利比亚干预别国事务导致其国家形象受损，国际地位日益衰落。

三 利比亚政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反观利比亚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历程，地缘分裂和部落问题始终困扰着利比亚的政治整合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地缘分裂和部落传统的相互作用下，催化了利比亚政治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政治合法性形成挑战。此外，外部势力频频干预利比亚内政，造成其政治发展进程的滞后甚至中断。利比亚联合王国在大国的干预下独立，也是在大国的干预下，卡扎菲政权最终倾覆。进入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各派势力割据混战，乱象丛生，政治稳定之路遥遥无期。对于现阶段的利比亚而言，相比于经济发展和问题解决，结束混战的局面和建立统一的国家是其面临的更为紧要的任务。

（一）利比亚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独立以来，利比亚的政治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伊德

^① Maximilian C. Forte, *Slouching Towards Sirte: NATO's War on Libya and Africa*, Chicago: Baraka Books, 2013, p. 161.

里斯一世时期，利比亚完成了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过渡。二战后，经过各方的利益博弈，利比亚正式宣布独立，建立联邦制王国。总体上来说，利比亚在独立之初建立联邦制是符合其国情的。但随着利比亚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联邦制已经不再符合利比亚的国情。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发现使经济发展需要地区间的相互配合，而联邦制的松散性对石油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1963 年，利比亚宣布废除联邦制，从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过渡到单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府改组了地方机构，将政治和经济大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利比亚并没有经历民族独立运动，伊德里斯国王缺乏民族领袖的光环，王国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国的支持，这削弱了其政权的合法性，王权统治危机四伏。

第二阶段是卡扎菲威权统治时期，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三理论”，并在该理论的支持下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改革。利比亚在卡扎菲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飞速提高。随着时代的变迁，利比亚国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卡扎菲的革命思想不再合乎时宜。在卡扎菲统治后期，部落叛乱不断，年轻人因为失业等种种问题对卡扎菲的保守和专权感到不满。另外，卡扎菲执着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和革命输出，干预别国事务，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反对。卡扎菲所倡导的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不当的外交言行招致了西方国家的反对和制裁，动摇了卡扎菲赖以维系的统治基础，使利比亚处于内外交困之境。中东剧变最终激化了利比亚社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卡扎菲政权的垮台，他组建的安全机构也随着他的垮台而崩溃。

第三阶段是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重建，在卡扎菲威权统治垮台后遗症的影响下，该阶段利比亚的政治发展遭遇多重困境。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开启重建工作。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卡扎菲的殒命及其政府的垮台并没有为利比亚带来民主和自由，利比亚民众的希望幻灭，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之中。利比亚东西部政府严重对立，它们各自为政，地方和部落势力拥兵自重，政治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成为奢望，统一形式的民族团结政府形同虚设。目前，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前景并不乐观，利比亚需要在国家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和发展道路这三个方面做出选择，寻找一条适合利比亚政治发展的道路才是关键所在。此外，

在国家领导者的人选上，被誉为“利比亚塞西”的哈夫塔尔是利比亚政坛的主要关注点，在领导利比亚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鉴于哈夫塔尔年事已高，利比亚的统一以及领导者的人选依然存在变数。

（二）利比亚政治构建的困境

利比亚的政治构建面临严峻的困境。其一，单纯追求民主政治，政府效率低下。利比亚政治经历了克里斯马强权人物的长期执政，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对中东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政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利比亚民众对美国宣传的民主政治充满美好幻想，最终推翻了卡扎菲政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存在缺陷，利比亚尚未形成拥有自觉民主意识的市民阶层，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容易造成利比亚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西方国家既不考虑利比亚的实际国情，也没有为其重建做充分准备，就以军事干预的形式终结了卡扎菲政权，导致利比亚社会持续动乱，经济衰退，同时也加重了欧洲自身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羸弱和地方政府的分裂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困扰着利比亚的重建。自中东剧变至今，利比亚的政治并没有像埃及那样，从宗教势力的代表穆尔西再回到强人塞西的统治，也没有像突尼斯那样，实现世俗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和解，完成政治过渡，更没有像阿曼等君主国那样以“渐进模式”实现稳定。反而陷入了地方组织及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情形阻碍了利比亚的政治发展。^①

其二，利比亚的经济建设面临困境，并与动乱的安全环境形成恶性循环。政治的稳定离不开民生问题的解决。利比亚虽然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但经济结构单一，长期处于畸形状态。此外，长期的国际制裁尤其是“洛克比空难”后，国际制裁的加剧，严重影响利比亚经济发展的步伐，阻碍了利比亚政治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的放缓直接导致失业率上升、社会失序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中东剧变的冲击下，社会矛盾一触即发。中东剧变并没有给利比亚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使利比亚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政

^① 王泰 《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80页。

治和经济危机。目前,利比亚的经济重建并不乐观,社会的动荡和安全环境的恶化是导致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利比亚反对派战时的团结在战后利益的分割中便不见踪迹,他们为争夺卡扎菲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厮杀混战,部落和民兵武装割据,政党内部在领导权、政治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呈现出碎片化和分裂的局面。

其三,地区间的竞争重新抬头,损害了统一国家的构建,政治整合艰难。在 2011 年最早的抗议活动之后,班加西脱离了卡扎菲政权。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冲突状态,而混乱的局势加深了各自的矛盾。各武装团体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愿景有着不同的期待,面对政治分裂和来自不同武装团体的压力,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应对力量仍然很薄弱。就中东大环境来看,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统一国家的构建问题,任务艰巨。究其原因,利比亚历史上的遗留问题以及卡扎菲的威权统治对其政局造成重大影响,分裂的地缘政治和强大的传统部落意识依然是政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另外,利比亚政治发展进程频频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历史上,利比亚长期受到外部势力的殖民掠夺。二战后,利比亚联邦制王国的建立如果脱离联合国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卡扎菲威权政府的倒台同样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严重依赖外部力量的干预。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利比亚“国民军”和民族团结政府间的权力斗争逐渐与地区代理人之间的战争相叠加。

(三) 利比亚政治转型的出路

对此,利比亚需要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转型道路。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既缺乏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①因此,第一,在利比亚建立稳定和良性政府具有必要性。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其政治绩效是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要认同资源,只有当公民对政权愿尽支持义务时,这一政权才具有合法性,如此统治才更有效力,政局才能稳定。利比亚反对派通过倡导建立民主和自由国家的口号,从而拥有了革命合法性,推翻

^①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 165 页。

了卡扎菲政权。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利比亚政府的任务已经不再是获取革命合法性而是建立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政治绩效低下，政府权威和民众支持缺失，民生问题凸显，革命合法性向统治合法性的转型面临重重困境。选举上台的人也会因为这些困境而无力行使权力，导致民主选举陷入恶性循环。在一个连最起码的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的社会里，空谈民主显得毫无意义可言。

第二，利比亚在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迫切性。贫穷是滋生动乱的温床，只有解决民众最为关注的生计问题，政府才能被认可，其统治合法性才能增加。对于利比亚而言，得天独厚的石油能源是推动其经济建设的优势所在。但是，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和安全局势的恶化导致石油出口锐减，不能满足利比亚政治经济建设所需的财政支持。利比亚石油命脉工业的石油管道遍布各地，受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阻碍，协调工作复杂漫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此外，受其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影响，利比亚投资环境恶化，外国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石油收入的削减制约着利比亚政治局势的稳定，而国内安全局势的动荡又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两者呈现出相互牵制的局面。^①就目前而言，制定经济战略愿景并不是利比亚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及其对利比亚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利比亚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

第三，认清形势，构建符合现阶段利比亚国情的政治认同。在卡扎菲时期，受纳赛尔主义的影响，利比亚注重构建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认同，导致利比亚陷入民族和国家构建的悖论之中，无益于利比亚现代国家的建设。对于利比亚反对派而言，他们在革命初期得到了阿盟的支持，因此与阿盟关系亲近，可见，利比亚的地区政策势必会转向阿盟国家。此外，利比亚反对派在战争中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支持，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也与卡扎菲时期大相径庭。利比亚应顺应民意，在避免卡扎菲统治悖论的前提下择民众所认同的阿拉伯属性，在建设利比亚现代国家的基础上搞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与西方国家的良性互动，将更符合利比亚现阶段的国情。

^① 闫伟、韩志斌 《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125～126页。

结 语

国家道路的选择直接关系国家的荣辱存亡，埃及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没能挽救利比亚，“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道路也并不适合利比亚。利比亚经历了长期的外族统治，他们在破坏当地传统的政治结构之后，建立了松散和有缺陷的殖民体制，这些体制缺乏社会根基，未能履行其经济和政治职能。受此影响，伊德里斯一世无法完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卡扎菲政权也没能摆脱利比亚部族政治传统的影响，其统治下的国家是一个由有限部落联盟组成的政治实体，厚此薄彼的部落政治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卡扎菲统治后期被迫的政治转型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利比亚的经济和民生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挽救威权统治免受内部的崩溃和外部的威胁。卡扎菲政权的垮台使利比亚出现了权力真空，分离主义、部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的政治分裂，为新生政府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缺失埋下隐患。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频繁的冲突更多的是源于对国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而非意识形态本身，它促使利比亚进一步陷入混乱、暴力和解体之中。就目前而言，东西部政权的对峙是利比亚政治建设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通过条分缕析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困境及其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可知，利比亚需要从政权更迭走向政治发展，建立稳定政府，改善社会治理。在联合国机制下通过和平手段重塑利比亚政治，承认其社会政治多样性和维护其领土完整是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主要措施。但是，国际援助并不足以在利比亚建立合法和可持续的机构，利比亚更多的是需要一个适应其文化传统的部落谈判机制。基于此，利比亚才能发挥部落政治优势，实现国家稳定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闫伟]

Keywords: Egypt; Israel; Egypt-Israel Peace; Anwar al-Sadat; Begin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1906 – 1911

Jiang Zhen

Abstract: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1906 – 1911, as a part of wave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 Asia-Africa-Latin American area, is a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ch mad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ran's history. Although the revolution brought the first constitu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the parliament closed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lay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absence of the formal military, the divergen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betrayal of Ulama. What's more, nationalism aiming at the restriction of the emperor could not change Ir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ouldn't prevent Western's plan to divide up Iran.

Keywords: Ir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Ulama; Qajar Dynas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Dilemma in Contemporary Libya

Li Xiaojua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iby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Kingdom of Libya, Gaddafi and Post-Gaddafi era. The form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edicaments in each stage are different. The United Kingdom of Libya was found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long period of foreign rule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 led to the lack of cohe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Libya,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royal power was charac-

terized by “fragility” . The Gaddafi regime is trapped by the geographical division left by history , the paradox of nation and state construction , and the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 resulting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in Libya. The Post-Gaddafi Libya has inherited many of th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Gaddafi era and has emerged new political crises.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edicamen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ibya , among which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Arab nationalism and islamic forces , the struggle between Arab nationalism and tribalism , and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pan-arabism and pan-africanism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leading to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Keywords: Libya; Political Dilemma; Political Legitimacy; Islamic Factors; Fribal Factors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aliban Movement and the Drug Problem in Afghanistan

Shen Yuhui

Abstract: The Taliban’s stance and policy on drug activ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it face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rise , the Taliban took a stand of anti-drug compliance with Islamic teachings , but met with widespread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short-term administration , the Taliban openly turned to the support of the drug finance , and its drug policy has shifted from prohibition to connivance. After the Afghan war , the Taliban’s dependence on the drug finances deepened.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hanges in its drug personnel , drug-related link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drug-related groups. In particular , the Taliban and other drug-related groups have shown sign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the drug problem , which will have a subtle influence on Afghanistan’s drug situation and politics. Even so , the importance of the drug finance to the Taliban and its control over the Afghan drug economy can-